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嬗变

刘中民 王利莘

摘 要：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创立于20世纪初阿犹冲突时期，它基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犹太人对“大以色列”的所有权，并发展出了“贝塔”“伊尔贡”“利库德”等组织。亚博廷斯基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反对唯物主义，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民族发展动力，主张为保留民族“特性”而斗争；反对左翼以经济和外交等手段解决民族矛盾，主张先增强武力，构筑对阿拉伯人的绝对优势（即“铁墙”）。继亚博廷斯基之后的修正派领导人分别对其思想进行继承与调整，共同点是加深民族主义与宗教思想的捆绑，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复国”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及其建国权利，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张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国，是以色列右翼集团在巴以问题上立场强硬、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泽耶夫·亚博廷斯基；“以色列地”；巴勒斯坦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王利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2020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5-0117-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阿拉伯人—犹太人冲突时期,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创立,它以对“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希伯来语为 *Eretz-Israel*)的诉求为核心,整合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军事力量优先,进而对一度居于主流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构成了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由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衍生出的政治组织“利库德”集团、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和青年运动“贝塔”(Beitar)^①等组织和运动,都对以色列政治、外交尤其是巴以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研究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以色列的内政外交。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对劳工运动主导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了挑战,其创始人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②通过修正劳工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亚博廷斯基的思想对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等以色列政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利库德”集团奉为精神指南。因此,研究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也有助于认识以色列政治思想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性。

国外学界围绕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尤其是其创始人亚博廷斯基思想的研究争议颇大。一部分学者将亚博廷斯基的思想归结为军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其代表性文献是柯林·辛德勒(Colin Shindler)的《军事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③

① “贝塔”全称“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的誓约”(Brit Yosef Trumpeldor),源于被尊为犹太战斗英雄的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特伦佩尔多曾参与 1904 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与亚博廷斯基一同组建“骡马军团”(Mule Corps,希伯来语写作 *Gàuà Nahage Ha-Preàot*,指以东欧犹太移民“志愿者”为主的“锡安骡马军团”[Zion Mule Corps],他们服务于英国军队,对抗当时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并推动犹太移民定居巴勒斯坦。1920 年,特伦佩尔多与数名其他犹太人在特拉哈依(Tel Hai)定居点阿犹冲突中被杀,并留下名言“没关系,为我们国家而死是好事(Never mind, it is good to die for our country)”。虽然围绕遗言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特伦佩尔多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战斗英雄。参见 Galit Noga-Banai, “The Contested Ownership of Yosef Trumpeldor’s Arm-Reliquary: A View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05, No. 3, 2015, pp. 399-414。

② 泽耶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1880~1944),以色列“右翼之父”、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他出生于时属沙俄的敖德萨,后留学于意大利罗马,在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英国和俄罗斯等都有活动。

③ Colin Shindler, *The Triumph of Military Zio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 Right Paperback*, London: I. B. Tauris, 2006.

以及《应许之外的土地》^①,埃兰·卡普兰(Eran Kaplan)的《有缘由的反叛:希勒·库克、贝京与亚博廷斯基的意识形态遗产》^②和《犹太激进右翼》^③等,这些研究都将修正派归为“军国主义”或“军事犹太复国主义”,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对修正派运动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提出源于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思想在本质上仍属于自由主义,其代表性文献是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和修正派对唯物主义的反抗》^④。萨森·索弗(Sasson Sofer)同样关注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对欧洲自由民主思想的吸纳,虽认为犹太修正主义者多为极端分子,但也指出以法西斯类比修正派是不恰当的。^⑤以上两种研究援引了亚博廷斯基本人的不同论述作为佐证,难免有失偏颇。另有一些文献整理或分析了修正派代表人物的信件和文章,挖掘了大量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区的历史文献,其中包含犹太修正派名人的信件和文章;^⑥又如,《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不知名的文章》^⑦通过发掘多篇亚博廷斯基的文章,对其思想多方位探讨。泽耶夫·本雅明·贝京(Ze'ev Benjamin Begin)^⑧的演讲和文章合集本从修正派的视角对犹太复国运动进行了论述,强调修正派思想自亚博廷斯基起的延续性。^⑨简·佐普尔纳(Jan Zouplna)则对亚博廷斯基关于“铁墙”的文章的英文与俄文版本进行了对比,并将修正派与同时期犹太复国主义其他流派思想进行比较。佐普尔纳指出目前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英语和希伯来语之外语种的材料,二是对其思想的讨论常常缺乏历史性。^⑩

① Colin Shindler, *The Land Beyond Promise: Israel, Likud and the Zionist Dream*, London: I. B. Tauris, 2001.

②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③ Eran Kaplan, “A Rebel with a Cause: Hillel Kook, Begin and Jabotinsky’s Ideological Legacy,”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p. 87–103.

④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Jewish History*, Vol. 12, No. 2, 1998, p. 51.

⑤ Sasson Sofer, *Zion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sraeli Diplo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Eran Kaplan and Derek J. Penslar, *The Origins of Israel: 1882–1948*,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pp. 145–148.

⑦ Louis Gordon, “The Unknown Essays of Vladimir Jabotinsky,”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9, No. 1/2, 1997, pp. 95–103.

⑧ 梅纳赫姆·贝京之子,前“利库德”重要成员,2021年加入前“利库德”成员组建的中右翼保守党派“新希望党”(New Hope,全称为“新希望——以色列团结党”)。

⑨ Ze'ev B. Begin, *A Zionist St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⑩ Jan Zouplna, “Revisionist Zionism: Image, Reality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Narrativ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1, 2008, pp. 3–27.

国内学界尚缺乏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仅零散涉及相关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以色列政治时指出,“新犹太复国主义”^①是修正派的“复活”,也是利库德集团的思想武器^②。也有学者在考察利库德集团的意识形态时,把“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利库德集团的核心意识形态,强调利库德的理论体系发展经历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和“现代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三个阶段。^③还有学者在比较以色列工党与利库德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时指出,利库德集团的政策取向与其奉行的修正派思想密切相关。^④

综上所述,国外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亚博廷斯基等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利库德上台后修正派领导人的研究则更关注其自身执政理念的独特性和以色列右翼的政治共性,缺乏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嬗变表现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思想,国外研究少有将其放在修正派思想框架内考察的著作。国内尚没有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专门的研究,其研究多散见于以色列政治外交研究之中。因此,研究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缘起、核心、演化及其影响,无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形成过程

“以色列地”理念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核心,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正是据此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的主张。19 世纪末,围绕“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归属,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乃至“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当时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采取了以谈判斡旋为主、加紧建设犹太社区的策略,亚博廷斯基等对此强烈不满并选择脱离主流,创立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构建了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体系。

(一) 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国的理念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萌生

“以色列地”理念是包括修正派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宗教和历史渊源。该理念源于《旧约圣经》。根据《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等篇章记载,“以色

① 新犹太复国主义通常把回归并定居“大以色列”作为宗教和民族义务。

② 闫瑞松:《以色列政治》,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6 页。

③ 崔守军、吴诗尧:《以色列利库德党的意识形态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 2 期,第 123-126 页。

④ 钮松、张璇:《以色列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比较》,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116-133 页。

列地”大致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约旦河两岸到地中海之间。^①但由于《圣经》中古代地名难以确定,“以色列地”在地理上始终是模糊概念,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精神寄托。此外,犹太历史上的数度“大流散”(Diaspora)也深化了“以色列地”观念。长期流散的苦难与宗教历史相结合,使犹太人坚信要回归“以色列地”。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深受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进而主张建立以犹太人和犹太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国家。^②19世纪,“复国”开始具体化。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提出了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解决方法。^③后沙俄多地爆发屠犹惨案,更使一些欧洲犹太人渴望回归“家园”。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主张“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④,即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政权以光复民族,而巴勒斯坦是合适的地点之一。^⑤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泽耶夫·亚博廷斯基继承了赫茨尔的理念,主张在“以色列地”建立犹太人自治实体,领土囊括西岸的耶路撒冷和东岸的外约旦;他强调“赎回”约旦河两岸不仅是以色列人的责任,也是救赎全人类的“试验”。^⑥亚博廷斯基顺应了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把回归“以色列地”并建立自治政权视为犹太民族自决权的关键部分。^⑦他认为,建立“民族国家”(nation)是每个“种族”(race)的目标;犹太民族有史以来的斗争,都是为了保存民族特性。^⑧在亚博廷斯基看来,犹太人既没有作为主体民族的立足之地,也没有本民族领导的政权实体,这是不公正的。因此,回归民族历史和宗教传统中的

① 根据《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5章提到,上帝将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赐予亚伯兰的后裔;《出埃及记》第23章提到,摩西统辖的范围是从红海到腓力斯人的海,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全部居民;《民数记》第34章对犹太圣地“迦南地”(Land of Canaan)东南西北四方边界做出了具体规定。参考《摩西五经》,冯象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第28、157-158、321-322页。

② Robert Eisen, *The Peace and Violence of Judaism: From the Bible to Modern Zio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42.

③ 闫瑞松:《以色列政治》,第5页。

④ “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主张以政治手段建立独立的“犹太民族国家”。

⑤ Bernard Reich, “The Founding of Modern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Judith R. Baskin and Kenneth Seeskin, eds., *The Cambridge Guide to Jewish History, Relig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60.

⑥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p. 59.

⑦ Louis Gordon, “The Unknown Essays of Vladimir Jabotinsky,” p. 98.

⑧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p. 53.

土地并重建犹太民族国家,是犹太人的权利。

“上帝的选民”是亚博廷斯基论证犹太复国合法性的重要概念。他指出,“以色列地”是上帝所赐,犹太人是“律法制定者、先知和征服者的后裔”。“守护这个民族的天使”将会通过“被选中的人”发声。^①而信仰不同宗教的阿拉伯人自然不是“被选中”的子民,因而不具有对“以色列地”的合法性。因此,“上帝的选民”这一宗教信仰强化了亚博廷斯基对犹太民族特殊性的认知,也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依据。

(二)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及修正派的形成

伴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性质从宗教走向世俗、目标从模糊转向清晰,其内部分歧也随之增多,进而为日后主流犹太复国主义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尽管双方均继承了赫茨尔的理想,但在最终目标、意识形态、实现手段等方面都存在鲜明的差异。

犹太复国运动由来已久。早在公元 1 世纪“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就相信上帝将派“弥赛亚”惩戒压迫者、带领犹太人回归家园,^②但并不赞同激进斗争。^③总体上,19 世纪前犹太人虽通过宗教等形式维持了对“以色列地”的向往传统,但并未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此后,受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和排犹浪潮影响,犹太人开始有组织地移民巴勒斯坦地区。1882 年,犹太移民团体“锡安山热爱者”(Lovers of Zion)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踏出了实质性“复国”的一步。在随后两波“阿利亚”(Aliyah)^④中,大批移民流入巴勒斯坦,建立数十个定居点和犹太社区。^⑤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左翼^⑥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在巴勒斯坦地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左翼组织掌握了该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经济与对外联络大权,控制着民族武装。^⑦1920 年,“以色列工人总会”

① Louis Gordon, “The Unknown Essays of Vladimir Jabotinsky,” p. 100.

② Robert Eisen, *The Peace and Violence of Judaism: From the Bible to Modern Zionism*, p. 66.

③ Ibid., p. 99.

④ 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

⑤ “Map of Pre-1948 Palestine: Jewish Settlement in Palestine (1881–1914),”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ap-of-jewish-settlement-in-palestine-1881-1914>,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⑥ 一些文献将当时的犹太复国运动主流概括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或“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Zionist Labor Movement),但其与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存在诸多不同。

⑦ Sasson Sofer, *Zion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sraeli Diplomacy*, p. 20.

(*Histadrut*)^①组建,它引领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在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领导下,多个犹太劳工运动组织于1930年合并为“以色列工人党”(Mapai)^②,后成为主导以色列政坛数十年的以色列工党。然而,以色列建国前犹太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工人阶级,并且在促进移民和提高就业率方面依赖外部资金捐赠,而非无产阶级的力量。^③因此,左翼犹太复国运动呈现畸形发展的特征,亦即它不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而是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和资产阶级紧密合作。^④如早期左翼犹太思想家贝尔·博罗霍夫(Ber Borokhov)认为,被压迫民族独立建国是阶级斗争成功的先决条件,但他将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列强的恩赐之上。^⑤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与主流的分歧源于实现建国目标的方式。一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允许犹太社区建立自治机构,^⑥但严格限制其武装能力。亚博廷斯基长期呼吁发展“犹太军团”,抨击左翼将阶级问题置于民族需求之上,强调犹太复国运动应当为建立民族国家服务。他强烈反对受英军控制的犹太劳工兵团,要求建立“犹太自卫军”,还曾因此被殖民当局逮捕。^⑦

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先发展犹太社区,通过经济手段和“外交”逐步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对此,左翼力图避免将问题归结于阿犹民族矛盾,甚至否认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并证明犹太人主导该地区是当地人的福祉。犹太“劳工团结党”(Ahdut Ha'avoda)创始人之一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提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因为本地阿拉伯人是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混合群体,并非某个敌对的单一民族。^⑧左翼中也有呼吁

① “以色列工人总会”(Histadrut)全称为“HaHistadrut HaKlalit shel HaOvdim B'Eretz Yisrael”(General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in Eretz Israel)。

② “马帕伊”(Mapai)全称为“Mifleget Po'alei Eretz Israel”,即“以色列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Eretz Israel),后演变为现在的以色列工党。从以色列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工党始终主导以色列政坛。

③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33-39.

④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6.

⑤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8.

⑥ Bernard Reich, “The Founding of Modern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 264.

⑦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p. 4-5.

⑧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p. 39.

为土地“救赎”牺牲的声音,但“战斗”被视为低于“建设”的消极手段。^①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与主流针锋相对,主张直面“民族矛盾”,发展犹太武装。亚博廷斯基指出,阿犹矛盾是两个民族围绕生存空间的竞争。他强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企图是消灭犹太民族国家;呼吁犹太人确立力量优势,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平等谈判”^②解决问题;认为自决原则应考虑到每个民族的生存,而不仅是按当地的民族人口比例——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数量超过其种植面积 5 倍,因此应当将其未耕种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犹太人。^③

此外,亚博廷斯基认为,建立政权与发展经济没有必然关系。^④他极为不满左翼将“复国”分解成细枝末节,而是主张直接战斗。^⑤1937 年,阿拉伯起义白热化时期,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地下军事组织“伊尔贡”在修正派的鼓动下宣告成立。不同于以色列工人总会组建的“哈加纳”(Haganah)^⑥以防护定居点为主,“伊尔贡”主动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爆炸^⑦、耶路撒冷火车站袭击^⑧等暴力事件。

丘吉尔白皮书^⑨是亚博廷斯基与主流犹太复国运动分道扬镳的导火索。亚

①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137.

② Efraim Kars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of Ze’ev Jabotinsky: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ordechai Sarig.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99. 162 pp. \$ 47. 50. (\$ 24. 50, paper),”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8, No. 2, 2001, <https://www.meforum.org/1403/the-political-and-social-philosophy-of-zeev>,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③ Louis Gordon, “The Unknown Essays of Vladimir Jabotinsky,”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p. 99.

④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p. 53.

⑤ Eran Kaplan, “A Rebel with a Cause: Hillel Kook, Begin and Jabotinsky’s Ideological Legacy,” p. 89.

⑥ “Hagana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自卫”。

⑦ 1946 年 7 月,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遭到“伊尔贡”等右翼组织炸弹袭击,死伤百余人,受害者不仅包括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也包括犹太人和其他国家公民。参见“The Bombing of the King David Hotel,”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10.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⑧ “The Raid on the Jerusalem Railway Station,”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11.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⑨ 即 1922 年由时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发布的《白皮书》(*British White Paper of June 1922*)。《白皮书》旨在为缓解巴勒斯坦地区民族矛盾,在维持《贝尔福宣言》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承诺的同时限制犹太移民,强调英国“并未考虑将整个巴勒斯坦转变为犹太民族家园”。《白皮书》全文参见“British White Paper of June 1922,” *The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rwh1922.asp, 上网时间:2021 年 11 月 20 日。

博廷斯基认为,白皮书导致犹太人“失去”了巴勒斯坦,但左翼领导人却接受了它。^①他对英国发布的《贝尔福宣言》和皮尔分治计划^②均持不同程度的反对,认为前者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应囊括约旦河两岸,后者规划的犹太国家版图不应排除耶路撒冷等对犹太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部分,但主流却默许了这些方案并与殖民当局进行合作。亚博廷斯基关于建立“犹太军团”的倡议也未获得主要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他辞去了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执行委员会的职务,创立“贝塔”青年运动,其成员更重视实践,手段也更激进。^③20世纪30年代,左翼抨击修正派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使其在整个犹太复国运动中逐渐边缘化。^④此后,修正派运动与主流的裂痕愈深,并于1935年成立了“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New Zionist Organization, NZO)^⑤。

二、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意大利的经历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的统一使亚博廷斯基坚信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族国家,他甚至将意大利当作精神上的故乡。^⑥

20世纪初,亚博廷斯基秉持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阿犹民族矛盾的客观现实相结合,对修正派思想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多次批评左翼的妥协行为,并且强调两个民族的土地诉求不可兼容。总之,修正派思想深受欧洲民族主义影响,而同期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也对其思想的形成发挥了外在刺激作用。

①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Updat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p. 27-30.

② 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大罢工,巴勒斯坦局势动荡,英国政府派遣的皮尔委员会提出分治计划,即在英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

③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9.

④ Ibid.;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p. 51.

⑤ “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要在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推动东欧国家犹太人向“以色列地”移民,并一度独立于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委员会与波兰等国进行外交沟通。但1940年前后因战争和亚博廷斯基去世等原因,该组织的许多对外活动宣告停滞或失败。参见 Howard Rosenblum, “Promot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Solve the Jewish Problem: The New Zionist Organization’s Alliance with Poland, 1938-1939,”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9, No. 3, 1991, pp. 478-501.

⑥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p. 3-4; Colin Shindler, *The Land Beyond Promise: Israel, Likud and the Zionist Dream*, p. xvi.

（一）反对纯粹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 倡导“民族斗争”

为否定左翼犹太复国主义, 亚博廷斯基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 构建了基本的意识形态框架。首先, 亚博廷斯基反对纯粹的唯物主义。他认为“物质的方式”并非唯一的“生产方式”, 内在的“精神”(psychic) 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① 其次, 阶级斗争也是亚博廷斯基批判的重点。他认为, 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道德的”, 因为中产阶级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先驱提供了资金支持^②; 主流的左派劳工运动及组织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中产阶级才是其先驱; 犹太民族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 而是为捍卫民族特性、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③。

（二）强调土地完整、建立“铁墙”, 实现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主导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认为, 回归“以色列地”有两方面含义: 领土完整, 并且由犹太人主导。尤其是在领土完整方面, 将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分离在历史和现实方面都是“不公正的”^④。这也是修正派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分歧, 以及前者脱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等组织的直接原因。

为实现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主导, 亚博廷斯基提出了“铁墙”(Iron Wall) 理论。他认为, 阿拉伯人不会自愿接受安排, 而会竭力阻止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地”, 因此要建立牢不可破的“铁墙”来断绝他们驱逐犹太人的念头^⑤, 必须增强犹太军事力量。但是, 亚博廷斯基重建“犹太军团”的想法遭到了左翼领袖哈依姆·魏茨曼的反对, 后者认为这会挑起仇恨、阻碍犹太社区建设。^⑥ 魏茨曼通过外交和谈判维持和平、积累经济实力的做法, 同样遭到了亚博廷斯基的批评。但也有学者指出, 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用犹太人自己的刺刀还是英国的刺刀来建立“铁墙”。^⑦ 亚博廷斯基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并被后人注入了种族隔离思想。分隔犹太与巴勒斯坦人的“隔离墙”, 也被视为“铁墙”概念的变相实现。

综上所述, 早期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可概括为: “以色列地”塑造了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含义的犹太民族特质, 犹太人为保留民族特质而回归的斗争关

① Joseph Heller, “Zeev Jabotinsky and the Revisionist Revol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Search of a World View,” p. 52.

② Ibid., p. 55.

③ Ibid., pp. 52-53.

④ Colin Shindler, *The Triumph of Military Zio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 Right*, p. 87.

⑤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Updated and Expanded)*, pp. 32-35.

⑥ Colin Shindler, *The Triumph of Military Zio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 Right Paperback*, p. 91.

⑦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Updated and Expanded)*, p. 36.

乎存亡,且有利于当地的发展;犹太复国的斗争应以中产阶级为先驱,建立军事优势的“铁墙”。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刊物《火炬》(*Avukah*)集中表达了其理念:“家园不是靠金钱或琐事建成的,而是靠追求这个目标的人们的自我牺牲建成的。”^①

亚博廷斯基特别重视组织犹太青年加入复国运动。他创立了青年运动“贝塔”,其成员被称作“新犹太人”的先锋,被视为对“旧”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叛精神和英雄主义。^② 亚博廷斯基为该运动创作的《贝塔赞美诗》(*Betar Hymn*)体现了该组织的斗争热情:“新种族诞生于血与汗之中……死亡或是征服那座大山。”^③

除亚博廷斯基外,其他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波兰传播修正派思想的尤里·泽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eenberg*)将“弥赛亚”观念写入了民族主义诗歌,并且更加强调武力,批判左翼的温和姿态;在《一个真相,而不是两个》中,他写下了“土地无法用金钱交易”“只能用鲜血征服”等诗句,表达只有战斗才能迎来“弥赛亚”降临。^④ 更为激进的阿巴·阿奇米尔(*Abba Achimeir*)则创立了自称是法西斯主义的地下军事组织“暴徒联盟”(*Brit HaBiryonim*)进行反抗英国的斗争。但亚博廷斯基反对过度军事化,因此这些更加激进的思想都未能主导修正派。^⑤

(三) 重视语言教育,复兴犹太民族语言希伯来语

亚博廷斯基重视教育,坚信语言文字的力量。他本人身为作家兼诗人,发表了大量关于“复国”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希伯来语教育,强调希伯来语将是巴勒斯坦内外犹太人下一代的语言,其习得必须优先于阿拉伯语。^⑥ 他认为,“血缘、历史和语言的共同纽带”才能使人们凝聚在一起,独特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希伯来语要成为一种“活的语言”。^⑦

上述重视出于亚博廷斯基对犹太文化优越性的强调,也是其论证“以色列地”合法性的一部分。他认为,犹太人与东方(尤指阿拉伯人)“毫无共同点”,犹

①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73.

② Eran Kaplan and Derek J. Penslar, *The Origins of Israel: 1882-1948*, pp. 145-146.

③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William Temple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2-163.

④ Uri Greenberg, “One Truth and Not Two,” Laurence Cramer, trans., *Save Israel*, <http://saveisrael.com/greenberg/greenbergtruth.htm>,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日。

⑤ Colin Shindler, *The Triumph of Military Zio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 Right Paperback*, p. 13.

⑥ Ibid., p. 129.

⑦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48.

人回归“故土”将把西方先进文明带入专制、落后、停滞的东方,^①有利于巴勒斯坦的发展。

总之,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源于犹太民族宗教、文化和历史认知,并且结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其突出特点是强调犹太复国运动的民族主义本质和崇尚武力。修正派曾一度被英国政府界定为“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②从创立至今,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一直受到来自以色列内外的批判,甚至被称为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三、建国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以色列的发展

继亚博廷斯基之后,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阿里埃勒·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政治家进一步发展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作为精神指南铸造了以色列政治中的右翼中坚力量——利库德集团,进而对以政治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一) 梅纳赫姆·贝京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贝京在青年时期就已加入“贝塔”运动,并于 1938 年成为该运动波兰分支的领导人。亚博廷斯基去世后,修正派运动内部不少人开始排除其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影响,使整个运动更趋强硬务实,贝京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以色列建国之初,贝京带领部分“伊尔贡”成员成立“自由运动”(Herut)^③参与议会选举。“自由运动”于 1965 年组建右翼政治联盟“加哈尔”(Gahal)^④,并加入工党组建的民族团结政府。1977 年,贝京领导右翼政党集团“利库德”赢得大选,打破左翼主导政坛的局面。从 20 世纪 40 年代崭露头角至 80 年代初退出政坛,贝京可谓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京认同亚博廷斯基关于“以色列地”包括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主张,并特别强调它的神圣属性和民族属性。

第一,贝京特别强调“以色列地”包括约旦河两岸的完整性。早在以色列建

^①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p. 27-30.

^② Calder Walton, “How Zionist Extremism Became British Spies’ Biggest Enem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1/01/how-zionist-extremism-became-british-spies-biggest-enemy/>, 上网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

^③ “Herut”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自由”。

^④ “加哈尔”(Gahal)全称“Gush Herut-Liberalim”,由“自由运动”与另一右翼组织“自由党”的首字母缩写结合而成。

国前夕,贝京就以“伊尔贡”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发表讲话,号称以犹太人“不可剥夺的历史权利”的名义,宣布主张阿犹分治的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是“非法肢解我们的家园”,也“永远不会被承认”。^① 贝京认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源自先祖与上帝的契约,因此是神圣的、永恒的、不容违背的。贝京否认其他族裔对“以色列地”(巴勒斯坦)的权利,也拒斥委任统治,这显然不同于亚博廷斯基曾提出犹太国家可作为英联邦成员的迂回。贝京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一律界定为“外国人”,强调要实现犹太民族权利,就必须将“以色列地”“从外国人的非法控制下解放出来”。土地的完整性成为修正派运动的核心。1949 年,贝京就把约旦河东岸视为以色列的外交难题。他在以色列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称:“在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约旦河东岸。”^②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贝塔”运动全国大会开幕式上,贝京提出“没有家园的完整性,我们就没有使命”。他领导下的“自由运动”在第二届议会选举中的纲领也强调了“家园完整性”。

第二,贝京特别强调犹太民族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并据此论证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地”权利的排他性。贝京的思想以“亚伯拉罕之约”为真实历史事件和政治诉求基础,强调其不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神圣性、排他性和永恒性。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超时间的”(supra-temporal)^③非唯物主义的史观。在他看来,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和其他族群的定居、英国的委任统治等客观事实,都对“以色列地”的归属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根据犹太教的历史,犹太人经历了远离故土的千年“大流散”,但这种人地分离亦无法削弱犹太人对约旦河两岸的排他性权利;“大流散”不过是“回归”的必经之路,是“赎回”必要的一部分。

贝京这种历史观刻意强调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进而将犹太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分开来。首先,由于上帝仅与希伯来人缔约,因此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诉求是唯一且特殊的。其次,世界各民族被二元划分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犹太人在历史上始终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迫害,包括从“巴比伦之囚”到近代以来欧洲的反犹主义,再到数次阿拉伯起义和中东战争对犹太人的武装斗争等等。因此,贝京试图把阿拉伯人的行动与纳粹德国的屠犹举动联系起来,甚

^① Arye Naor, “Hawks’ Beaks, Doves’ Feathers: Likud Prime Minister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y,”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 156.

^②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 163.

^③ Arye Naor, “Hawks’ Beaks, Doves’ Feathers: Likud Prime Minister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y,” p. 157.

至把阿拉伯人称作“纳粹的继承人”。^① 他据此认为,在“敌人”包围之下,犹太人必须主动保卫自身的生存权。

第三,强调主动进行军事斗争也是贝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贝京认为,军事斗争不是潜在的事物,而是政治现实中的日常必需品。亚博廷斯基曾指出,只有年轻一代“学会射击”,犹太民族才有希望;贝京则强调,不仅要“学会”射击,而且“必须”开枪射击。^② 早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贝京就对犹太年轻人称“我们已经受够了放弃;我们想要战斗——要么死亡,要么胜利”。1938年,时任“贝塔”波兰分支领导人的贝京宣布,“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结束,军事而不是政治将成为重心。^③ 1948年,贝京批评本-古里安政府未能及时准备好充足的军事力量,导致“我们的民族被残害”^④。可见,贝京认为军事斗争而非政治斗争,是争取“家园完整”和犹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贝京的思想使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出现了两方面变化:第一,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将宗教神话宣传为真实历史并据此提出政治诉求,其意识形态进一步远离唯物主义。第二,强权哲学及其实践彻底成为修正派运动的鲜明特点。自贝京成为修正派重要领导人至以色列建国前夕,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其突出体现是在震惊世界的大卫王酒店事件和戴尔亚辛惨案中。^⑤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导致贝鲁特发生屠杀惨案,更是修正派黩武特点的集中体现,并导致贝京政府在以色列国内都备受指责,直至贝京完全退出政坛。

(二) 伊扎克·沙米尔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沙米尔是“贝塔”运动和“伊尔贡”的重要成员,曾参与大卫王酒店事件和戴尔亚辛事件^⑥。1970年他加入贝京领导下的“自由运动”。沙米尔在以色列政治家中以强硬闻名,曾被称为“最后一位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他高度赞扬亚

^①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pp. 164–165.

^② Ibid., p. 162.

^③ Ibid., p. 88.

^④ Colin Shindler, *The Triumph of Military Zio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 Right Paperback*, pp. 206–222.

^⑤ 1948年4月,“伊尔贡”联合原为其分支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斯特恩帮”(Stern Gang)突袭位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阿拉伯村庄戴尔亚辛(Deir Yassin),造成数百阿拉伯民众伤亡。时任“伊尔贡”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长期否认戴尔亚辛存在屠杀事件。

^⑥ James G. Smart, “Yitzhak Shamir (1915–2012): Not the Only Terroris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No. 31, Vol. 6, 2012, pp. 22–23;高世同:《沙米尔其人其事》,载《世界知识》1983年第19期,第19–20页。

博廷斯基的“行动派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 activism)对自己的影响。^① 作为北京的老战友,沙米尔重视军事优势,强调正是以色列的强大迫使阿拉伯人接受了它的存在。

1980年,沙米尔就任以色列外长后便提出关于巴以冲突的“三不”原则:不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耶路撒冷属于阿拉伯领土。1983年9月,北京向议会提出辞职,提名沙米尔继任总理,同时接替其在利库德集团和“自由运动”中的领袖角色。沙米尔正式成为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沙米尔在继承亚博廷斯基和北京思想的基础上,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进行了发展。

第一,沙米尔强调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可分割,重视以具体的定居方式占据“以色列地”。沙米尔认同亚博廷斯基对民族(人民)与所居住土地关系的观点,认为民族历史和宗教同时为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提供了合法性。为合理解释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所有权,沙米尔在《以色列40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文中称,过去“自称为‘巴勒斯坦人’的人群只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强调在以色列“三千年的国家历史”中,唯独存在犹太主权实体。^② 沙米尔认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具有延续性且不可变更;任何把犹太人与其历史家园分割开来的历史观都是在“谋杀历史”。^③ 他还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就是确保犹太人可以在“大以色列”的任何一片土地上定居。^④ 沙米尔延续了北京时期对“家园完整性”的追求,把移民巴勒斯坦视为实现对“大以色列”土地诉求的具体方式,加强了对应的政治经济支持,不断推进犹太定居点建设由此基本成为修正派掌权后的政策传统。

第二,在领土问题上,沙米尔认为“维持现状”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其思想具有两面性。不同于亚博廷斯基和北京,沙米尔担忧建立“跨约旦河两岸”的“大以色列”已经不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他更强调“维持现状”,即掌握已占有的土地。但是,沙米尔的思想也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沙米尔在执政时会出于政治考虑展现妥协的一面。例如,他多次强调犹太民族与生俱来的和平属性,提出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缔结和平条约,结束与邻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为生活在以

^① Meron Benvenisti, "The Last Revisionist Zionist: History Left Yitzhak Shamir Behind,"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1, 1995, pp. 171-176.

^② Yitzhak Shamir, "Israel at 40: Looking Back, Looking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3, 1987/1988, p. 575.

^③ Arye Naor, "Hawks' Beaks, Doves' Feathers: Likud Prime Minister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y," p. 174.

^④ *Ibid.*, p. 171.

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有限的自治权。”^①另一方面,沙米尔在下野时又强烈反对以色列政府签署的和平协议。例如,他批评奥斯陆协议其将以色列“关进牢笼”;他谴责内塔尼亚胡签署希伯伦协议是“背弃我们的事业”;他还强调以色列已经“没有妥协余地”,因为“以色列历史悠久的土地的一半已经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②

第三,沙米尔从民族和民主权利两方面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沙米尔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激烈反对巴解组织加入中东和平进程。在民族方面,他赞同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否认存在“巴勒斯坦人”的观点,这也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长期坚持的论点。沙米尔认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就是在“以色列地”上建立“外国政权”,不仅损害犹太民族权利,同时也将“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阿拉伯居民”置于“恐怖分子”的统治下。^③在民主方面,沙米尔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斗争上升到“恐怖势力”攻击“民主国家”的范畴,^④呼吁国际社会减少对巴解组织的支持。“冷战”的时代背景对沙米尔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把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等阿拉伯国家视为苏联附庸,并强烈反对苏联对巴解组织的军事支持。沙米尔指出,苏联对以色列的政策受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极权专制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普遍矛盾”。^⑤

总之,在沙米尔任领导期间,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具有表面上妥协、本质上更加强硬的典型特征。就表面而言,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大片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情况下,尽管难以完全实现“以色列地”诉求,但“维持现状”已经使以色列处于有利地位——“铁墙”势已形成,这是沙米尔表面上“维持现状”、承认阿拉伯人自治权利的根源所在。就实质而言,一方面,沙米尔拒绝与巴解组织和谈,消极对待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中东和平进程;另一方面,沙米尔又特别从“历史权利”的角度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权利的连续性和永恒性,坚决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族和民主权利均已得到实现进行狡辩,进而否认后者享有建国权利,维系利库德集团主张的“大以色列”。

① Yitzhak Shamir,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Toda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3, No. 2, 1996, p. 67.

② Arye Naor, “Hawks’ Beaks, Doves’ Feathers: Likud Prime Minister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y,” p. 171.

③ Yitzhak Shamir, “Israel at 40: Looking Back, Looking Ahead,” pp. 577–581.

④ Yitzhak Shamir,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Today,” p. 69.

⑤ Yitzhak Shamir, “Israel at 40: Looking Back, Looking Ahead,” p. 583.

（三）阿里埃勒·沙龙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沙龙早期曾参与左翼劳工运动,但对亚博廷斯基等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有同情。^①此外,沙龙自青年时期接受“哈加纳”军事培训起的数十年军旅生涯,也使他格外强调“军事”与“安全”的高度联系,与修正派的理念不谋而合。沙龙在20世纪70年代退伍后加入了利库德集团,曾先后于贝京、沙米尔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中担任要职。沙龙是利库德创建的重要推手,却也是该集团目前为止唯一一位非出身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对于修正派思想的直接阐释较少,但对比其政治生涯不同阶段,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对其影响明显。

自1977年进入利库德执政内阁到2005年正式脱离利库德之前,沙龙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将反恐与巴以问题挂钩和维护“犹太国家”属性三个方面。

第一,奉行强权哲学,通过军事行动遏制巴勒斯坦民族斗争。一方面,沙龙贯彻“铁墙”战略,以绝对实力优势迫使巴勒斯坦人在领土问题上妥协;另一方面,他坚持修正派对军事主动性的推崇,试图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粉碎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为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打下基础。^②沙龙从不讳言“以打促和”的意图。20世纪80年代,沙龙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指挥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得到“贝鲁特的屠夫”之名。^③2000年,沙龙突访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等宗教圣地,此举成为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导火索,巴以矛盾持续升级,后以军于2002年发动“防御盾牌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入侵并占领了西岸最大的六座城市及其周边城镇、村庄和难民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④然而,沙龙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会议致辞中,称该行动是一个“机会之窗”,能让

^① Ariel Sharon and David Chanoff, *Warri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aperbacks, 2005, pp. 109-111.

^②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Revisite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41, No. 2, 2012, p. 88.

^③ “Arab World Marks Death of Sharon ‘The Butcher’,”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1, 201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lestinians-mark-death-of-sharon-the-butcher/>; Chelsea J. Carter, “Ariel Sharon: Hero or Butcher? Five Things to Know,” *CNN*, January 11, 2014, <https://edition.cnn.com/2014/01/11/world/meast/ariel-sharon-5-things/index.html>; Heba Saleh, “Sharon Victory: An Arab Nightmare,” *BBC*, February 6, 2001,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1156796.stm, 上网时间:2022年1月25日。

^④ 《秘书长根据大会ES-10/1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联合国,A/ES-10/186,2002年7月30日,<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499/56/PDF/N0249956.pdf?OpenElement>,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5日。

和平进程回到“更现实的轨道上”。^①“防御盾牌行动”也被认为是削弱利库德集团反对已久的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减少土地兼并障碍进一步执行“大以色列”计划。^②

第二,将“反恐”与巴以问题紧密挂钩,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合法性。沙龙并不区分民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一些极端主义“圣战”组织,往往将其统称为“恐怖分子”。沙龙还将“反恐战争”扩大到巴勒斯坦地区两族人民的百年冲突,认为以色列正在进行的是正义的“反恐战争”,而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这些恐怖组织”^③,甚至暗指后者煽动恐怖活动。此外,沙龙在多次官方发言中都将时任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贬为“恐怖分子”“和平的障碍”,拒绝与其直接谈判,为本就曲折的巴以和平进程设置了更多推进条件。可见,为提升正当性,沙龙既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所有权,也否定其抗争的合法性。

第三,高度重视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将巴勒斯坦人口增长视为安全威胁。沙龙对巴勒斯坦人人口增长超越以色列感到担忧,^④为确保以“犹太国家”特性,提出“单边脱离”(Unilateral Disengagement)计划。该计划事实上包括修建隔离墙和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离两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沙龙宣称为防止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需要使存在民族矛盾的巴以双方通过实质性“脱离”来实现和平。2002 年,在沙龙任期内,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饱受国际社会谴责的“隔离墙”建造计划。^⑤沙龙宣称“单边脱离”尊重两国方案,但该计划实际意在加强对已占领土的控制,通过脱离加沙地带维持以色列掌控地区内的犹太人口多数。^⑥“隔离墙”割裂了墙外的西岸其余土地,进一步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进程。^⑦“隔离墙”与脱离计划阻碍了巴以人民的往来,也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沙龙的“单边脱离”计划实质上是单方面重新划定巴以边界,这也体现了修正派的犹太人“历史权利”主张的排他性。为增强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沙龙还援引亚博廷斯基的话语,“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目标是

① “Message of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IPAC Policy Conference, Video Conference, April 23, 2002,” *Israel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https://israelnewsagency.com/aipac.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

②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Revisited,” pp. 93-94.

③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Middle East Peace with Prime Minister Sharon,” *USA. gov*, <https://2001-2009.state.gov/p/nea/rls/rm/22862.htm>, 上网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

④ 余国庆:《后沙龙时代以色列政局及对以巴关系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 2 期,第 10 页;黄鹏,张熠:《浅析沙龙政府的单边撤离计划》,载《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 4 期,第 14 页。

⑤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Revisited,” p. 93;“隔离墙”计划虽非沙龙首创,但在其任内开始落实。

⑥ Ilan Peleg and Dov Waxman, *Israel's Palestinians: The Conflict With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2.

⑦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Revisited,” pp. 93-94.

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多数”,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并以政府拨款等方式推动。^①

然而,“单边脱离”还包括从加沙撤军并拆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犹太定居点,在坚持“大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内部遭到反对。2005年,沙龙正式脱离“利库德”组建中间党派“前进党”(Forward),其党纲即包括可以放弃一部分土地,使以色列成为犹太民族家园。^②沙龙在“以色列地”完整性上采取了务实立场,但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诉求存在偏差。

综上所述,沙龙领导期间,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在军事主动性方面大大加强,土地诉求的排他性达到空前高度,“铁墙”理论被变相实践,但也因是否继续坚持“大以色列”而在意识形态上面临根本挑战。相比过去“相信文字和法条力量”^③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沙龙对与巴和谈抱有更为消极悲观的看法。沙龙认为过去签署的一些和平协议只是“制造虚假希望”^④。这种看法也推动了修正派运动对于巴以问题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和措施,使巴以和平进程更为艰难。

(四)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密切相关,他是利库德集团的核心政治领袖和迄今在任时间最长的右翼总理。1967年,内塔尼亚胡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并参加了1973年中东战争。1988年,他作为利库德集团的成员当选为议员并出任以色列副外长。1991年他又任职于沙米尔的政府内阁,随后分别于1996年和2009年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为强调“民族文化”和以“两种和平”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第一,内塔尼亚胡对“犹太民族文化”的强调,突出表现为论证“回归”巴勒斯坦、建立和巩固统一犹太国家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内塔尼亚胡在其

^①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s Speech at the Jewish Agency Assembly,” *Israel’s Prime Minister/s Office*,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news/speech2806>, 上网时间:2022年8月18日。

^② 余国庆:《后沙龙时代以色列政局及对以巴关系的影响》,第7页;“Sharon: Israel Must Make ‘Painful Concessions’,” *CNN*, November 27, 2003, <https://edition.cnn.com/2003/WORLD/meast/11/27/mideast.sharon/>; Ari Shavit, “Sharon Says He Is Ready for Painful Concessions,” *Forward*, <https://forward.com/news/8634/sharon-says-he-is-ready-for-painful-concessions/>, 上网时间:2022年8月18日。

^③ Ariel Sharon and David Chanoff, *Warri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riel Sharon*, p. 983.

^④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s Address at the Herzliya Conference, on December 18, 2003,” *Haaretz*, August 16, 2005, <https://www.haaretz.com/2005-08-16/ty-article/prime-minister-ariel-sharons-address-at-the-herzliya-conference-on-december-18-2003/0000017f-f048-dc28-a17f-fc7fd84b0000>;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t the Fourth Herzliya Conference,”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CIE)*, <https://israeled.org/resources/documents/address-by-prime-minister-ariel-sharon-at-the-fourth-herzliya-conference/>, 上网时间:2022年8月18日。

所著《持久的和平》一书中,多次强调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同享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与此同时,他否认“巴勒斯坦文化”的存在,甚至坚称巴勒斯坦地区不仅从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国”,也没有巴勒斯坦民族或是文化。^①内塔尼亚胡认为,历史和文化,而非“征服”和“痛苦”,才是一个民族的土地所有权依据。据此,阿拉伯人一度“征服”巴勒斯坦地区的史实并不足以支撑其土地诉求。^②他提出,历史上,巴勒斯坦地区仅存在犹太民族主权实体,并且塑造了该地区的文化。此外,内塔尼亚胡还特别强调犹太教对犹太民族身份认同的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修正派的右翼民族主义与宗教的捆绑。^③

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强调“犹太民族文化”的目的,在于反对其政治对手工党在领土问题上的妥协,^④致力于实现修正派建立“大以色列”的目标。“民族文化”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工具。首先,内塔尼亚胡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文明和全人类文明的贡献,但却否认阿拉伯人的贡献。其次,他强调以色列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描绘为西方文明在中东的代言人,将犹太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渊源之一”,称是犹太人为地区带来了民主与文明。与此同时,他贬低阿拉伯世界“落后”“专制”“好战”,称其缺乏西方政治文化土壤,阿拉伯人对西方的仇恨和双方的文明冲突早于巴勒斯坦问题出现。^⑤

第二,内塔尼亚胡的“两种和平论”把和平划分为“民主和平”和“威慑性和平”,强调巴以和平只能是“威慑性和平”,进一步发展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内塔尼亚胡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和平,一种是民主国家间达成的民主和平,另一种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达成的“威慑性和平”,即“和平源于力量”。“民主国家”由于民意、政府负担等内部限制,趋向于保持和平;而“独裁国家”缺乏内部限制,只能依靠“民主国家”施加外部限制来达成和平。因此,“威慑”或“力量平衡”就是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认为,对以色列开战的阿拉伯国家数量下降、势头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即“以色列越强大,阿拉伯国家就越有可能同意和平”。内塔尼亚胡据此主张,以色列掌控西岸是持久和平的关键。^⑥以色列不能放弃对西岸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因为一旦阿拉伯人的安全优势相对上升,“独裁者”们随时会违背和平承诺。

① [以色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持久的和平》,田在玮、莎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绪论》第 1-3 页、第 12-33 页。

② [以色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持久的和平》,第 18-21 页。

③ 同上,第 22-23 页。

④ Arye Naor, “Hawks’ Beaks, Doves’ Feathers: Likud Prime Minister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y,” p. 166.

⑤ [以色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持久的和平》,第 69-74 页。

⑥ 同上,第 205-227 页。

“两种和平论”试图为以色列占领西岸土地、扩充军事实力提供合理性,并把阿以和平困境的根本原因归咎于阿拉伯国家未采用西式民主政体。内塔尼亚胡进一步将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为争取各自的政治合法性,煽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而引发暴力冲突。^① 总之,内塔尼亚胡继承和发展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实力优先的传统,并用“两种和平论”进行了理论包装。据此,内塔尼亚胡坚持“安全换和平”^②,反对工党一贯主张的“土地换和平”^③。

与沙龙相同,内塔尼亚胡也以“反恐”为名打击巴勒斯坦人武装,把巴勒斯坦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对其领袖进行“定点清除”,还试图把以色列政府与巴抵抗组织的矛盾描述为西方民主政府与反西方恐怖组织的矛盾。早在1976年“恩德培行动”^④后,内塔尼亚胡就主持成立了“约纳坦研究所”(Jonathan Institute),从事恐怖主义研究并组织反恐方面的国际会议。内塔尼亚胡本人在1995年出版的《打击恐怖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战胜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一书中,直指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自20世纪90年代起主要由“基于伊斯兰的恐怖主义”(Islam-based terrorism)造成,并受到伊朗等所谓“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的支持,是一种有组织的、针对“民主社会”的新型暴力,国家需要从社会文化等方面消除恐怖主义诞生的土壤。^⑤

在强调“民族文化”、重视军事实力的同时,内塔尼亚胡还十分善于重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道义性。他意识到黎巴嫩战争、犹太定居点建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等问题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因此通过强调爱好和平的犹太“民族文化”重塑犹太复国运动的道义,争取外界支持,改善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回归了亚博廷斯基时期修正派运动重视国际支持的传统,改变了修正派此前忽视对外形象的做法。在任期间,内塔尼亚胡利用国际和地区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积极发展与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现了美国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与多个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利益,助推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

以色列建国后,历届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基于变化的现实,对亚博廷

① [以色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持久的和平》,第88-89页。

② 指要求阿拉伯国家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为前提实现中东和平。

③ 指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为阿以和谈前提。

④ “恩德培行动”(Operation Entebbe),指1976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突击队突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犹太人质的一次军事行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兄弟约纳坦·内塔尼亚胡(Yonatan Netanyahu)作为军官参与其中并身亡,被以色列政府追悼为战斗英雄。内塔尼亚胡以他兄弟的名字为名成立了“约纳坦研究所”。

⑤ Binyamin Netanyahu, *Fighting Terrorism: How Democracies Can Defea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SG), 1995, pp. 47, 64, 337-343.

斯基思想框架内的修正派主导思想进行了调整。亚博廷斯基重视文化和军事力量；而贝京只相信犹太民族武装，沙龙对军事力量同样高度重视；沙米尔在强调军事实力的同时，又以“和平”为口号对周边数个阿拉伯国家表现妥协，非军事手段重要性开始凸显；内塔尼亚胡则顺应冷战后的总体和平环境，使政治和文化手段重新占据主导，但以“反恐”为名义并未放弃增强军力。修正派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思想普遍带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色彩。为实现“以色列地”目标，修正派运动重心经历了从政治与文化斗争到军事斗争、又回归政治与文化斗争的转变。其中，强权哲学是修正派信奉的不变内核。

四、结语

泽耶夫·亚博廷斯基作为创始人，奠定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体系，其目标是在“以色列地”即约旦河西两岸建立统一犹太民族自治实体，其中包括西岸的耶路撒冷和东岸的外约旦，为实现这一目标犹太人必须通过建立“铁墙”以掌控完整的“以色列地”。

贝京与沙米尔是“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①，沙龙将修正派的军事主动性推到高峰，内塔尼亚胡则发展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利库德集团初次上台以来，伴随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他们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调整。

比起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于和谈的相对妥协，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地”范围和性质、重建犹太国家的手段等方面都更加强硬。修正派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强调犹太人完全拥有“以色列地”，通过强大实力尤其是军事优势实现目标，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的存在及其建国权利。

利库德作为修正派主导的政治集团，其策略有一定的务实性。从戴维营协议到马德里会议，再到沙龙与阿巴斯会晤，以及内塔尼亚胡政府与阿拉伯国家缓和关系等，在维持意识形态不变的前提下，利库德出身的领导人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往往能顺势做出有限妥协；同时，为取得竞选胜利，他们选择与宗教政党加强合作。工党对“大流散”史等神话历史态度相对消极，使一些宗教政党为反对左翼世俗化历史话语而加入修正派主导的右翼政治联盟。修正派领导人对此予以回馈，执政后给予宗教人士在服兵役等方面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加深双方捆绑。内塔尼亚胡等组建的政府也被反对者批为“宗教政府”。

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关键特征始终是强调犹太“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犹

^① Ilan Peleg, "The Zionist Right and Constructivist Realism: Ideological Persistence and Tactical Readjustment,"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 133.

太复国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且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这是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纵观全文,可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思想和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以色列地”完整性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贯诉求。首先,“以色列地”这一名词有鲜明犹太属性。修正派成员通常使用“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等称谓企图完全兼并的领土,避免使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等相关表述,以加强正当性。其次,通过强调“以色列地”的完整否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的合法性。修正派领导人强调“以色列地”完整不可分割,以此否定工党“土地换和平”的主张,并以此反对签署奥斯陆协议、西岸撤军、控制定居点建设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举措。

第二,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注重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修正派一直基于对历史和宗教文献的选择性应用,从文化和道德两个方面强调犹太民族的优越性。在文化方面,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坚称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主权实体在巴勒斯坦地区应有唯一性,强调犹太人对“以色列地”有史以来固有的排他权利。在道德方面,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强调“大屠杀”和“异族压迫”的持久伤害,以增强“复国”的道义性。在内塔尼亚胡等人的思想里,这种民族优越性话语还植入了西方“民主和平论”的叙事,强调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对抗众多“独裁国家”的命题,这本质上是冷战后“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东版本。

第三,坚持实力至上思想和强硬立场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典型特征。从亚博廷斯基提出建立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铁墙”到贝京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斗争,从沙米尔重视行动主动性,到内塔尼亚胡主张“威慑性和平”,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皆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在以巴关系中坚持强硬立场和政策。他们坚持保留对西岸的实际控制,多次对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打击,体现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强权哲学。

总之,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硬立场从单一民族角度出发,争取排他性利益,追求军事力量优先的“威慑性和平”,不仅不利于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更无法实现中东地区“持久的和平”。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远)